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点滴

□ 储朝晖



40多年前,我因为“迷上陶行知”,从物理学转向对教育和“人理”的研究,以“把教育办得更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经过多年调查、实验与文献交融的研究与思考,我认为陶行知那一代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现代化产生了卓越影响,并为当今教育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止于人民幸福”办教育

教育大道是什么?陶行知将先秦时期《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改为“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将“明德”改为“民德”,意味着“德”的主体是人民,即反对用少数人确定的“明德”束缚、绑架大多数的人民;“亲民”曾被朱熹注解为“新民”并广为传播、接受,陶行知认为,无论人的学问多高都应该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尤其反对以居高临下姿态去改造、救助老百姓,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做自己的主人;更有价值的是,他将忽视人又显得抽象的“止于至善”改为“止于人民之幸福”,明确将人民作为教育的主体和目的,将追求幸福生活作为教育的目标。

这样的改变并不简单是词语的改变,而是陶行知认识到当时旧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实际是“吃人的教育”,它不只教人通过追求做人上人的路径去“吃别人”,还教人经由损害身体和独立思考意识与能力的方式“吃自己”,这样是不可能创造人民幸福的。

陶行知明确说,生活教育是要“遂民之情、达民之欲”,一切所教所学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他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1929年春,在晓庄学校的一次会议上,陶行知征求三个自告奋勇的同志去淮安办新安小学,每月只拿八元伙食费,没有薪水,当场有李友梅、吴辅仁(庭荣)、蓝九盛三人自告奋勇报名。会后,陶行知召集他们提出三点希望:一是你们到那里去创造,不是到那里去享受,你们是去为农人和儿童谋幸福,三人要和衷共济,凡事都以农人和儿童的利益为前提。二是要在教育上革命,进而办一种革命的教育。你们如果到那里去仍然办一种传统的学校,那就不必多此一举,而晓庄也就不需要这种远征的军力。三是到那里去是为了那里的农人和儿童办学校,这个学校办起来,马上就是那里的全体农人和儿童的共有物,不要把他们看成是你们三人或者此外的任何一个人的私有品。

要“止于大众之幸福”,就必须解放老百姓的创造力,解放包括孩子在内的所有人的双手、双眼、嘴、头脑、空间和时间。“止于人民幸福”,把教育办成人民通向幸福的通道,教育思想才能更加丰富,理论才能更加深厚,观念才能更加开放,政府、学校、家长才能从被堵的同一条胡同里走出来,教育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才能灵活多样,学生才有条件成为真实的学习主人。

教育就是教人做人、创造理想社会

纵观陶行知的思想和实践系统,其聚焦点在于培养人做人和创造理想社会,两个焦点互动而又融为一体。他曾经给教育下一个简短的定义:教育就是教人做人。如果把整个系统考虑进去,可以说教育就是教人做人、创造理想社会。

陶行知所阐述的做人,不同于两千年来我国古代传统儒家思想仅仅从道德维度讲做人,而是要培养同时有良好私德与公德和活力的人。陶行知对做人的标准先后提出做主人、真人、人中人、抬头乐干的人、自立立人的人、有献身和创造精神的人,追求高尚完美的人格。

1914年他在金陵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道:“故今日当局第一要务……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1923年,陶行知用“平民主义做教育的目的,试验主义做教育的方法”,发起了平民教育运动。此后,他针对当时社会上等级森严、纵向阶层和行业与地域横向隔离的问题,提出了“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四通八达的社会”的观点,又在阐述生活教育理论时提出“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把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教人做人创造理想社会,不同于就教育论教育、就社会论社会,就个人论个人,它跨越了长期的个体与群体本位之争,而是同时重视教育的个体发展与社会改造功能,同时重视学校与社会的教育功能发挥,把个体的成长、教育发展、社会改造当成一件事来做,实现做好人创造理想社会的共同目标。

做手脑相长的人中人

陶行知有一次看到学生作文中写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便让学生改为“吃得苦中苦,不为人上人”。他主张做人中人,既不做人上人,也不做人下人,想做做人上人的人同时依然是人下人,只有追求做人中人的才能接近自己的理想,陶行知这样的选择在现实社会中又属于更艰难的一种选择。中国传统社会中保有很强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浓厚,一度将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等,还认为“上智下愚不移”,教育领域还不能完全排除其影响。

另有一次,陶行知看到学生文字中使用了成语“埋头苦干”,便建议他改为“抬头乐干”,其意是让自己抬起头,看清方向,自主选择喜欢干的事,只有越干越快乐,才能持续不断地干下去。

陶行知主张人是自然和社会的本体,要教育并确保每个人做自己的主人,做社会和国家的主体。做主人就要明白造物不为物所役,要学会发明工具、使用工具。书也是工具,他曾经写诗道:“用书如用刀,不快自须磨;光磨不切菜,何以见婆婆。”由此我联想到,当下不少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原因之一就是成人社会中的孩子难以生成自己的主体性,缺乏自主意识和能力,分不清自己是目的还是工具。

1932年,陶行知在国立暨南大学教育系的演讲中说:目前中国教育的两条路线——教劳心者劳力,教劳力者劳心。这首歌揭示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分化在于手的分离与脑的发达;建立平等社会在于针对客观存在的脑力与体力分化问题,让一部分人“脑化手”,另一部分人“手化脑”。培养孩子需要认识到手脑相长的原理,让孩子在丰富体验基础上获得新知,才能更有效学习掌握好闻知,生成说知。

职业教育要培养“生利人物”

1918年,陶行知提出了养成生利人物的“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受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影响,我国古代社会中长期以来读书人是不敢言“利”的,尽管颜元做了“义利分”转向“义利合”的论证与辨析,清代徽州商人中也有士人从商的潮流,但是大多数教育人与受教育人仍然想尽各种办法避“利”而行。

而陶行知受黄炎培之约写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在《教育与职业》1918年第1卷第2期发表此文时,编辑为了解缓冲,特意加了个编者按道:“作者所谓‘生利’,当作‘生产’。”但纵观全文,陶行知表达的其实就是“生利”,生利之利,有利之利,有利之物。由此,陶行知在教育史上突破了旧有观念,将教育与生利紧密联系在一起。

陶行知认为生利既可以是“生有利之物”来“以物利群”,也可以是“生有利之事”来“以事利群”,所以把职业教育定位为“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以养成“生利人物”为主要目的。

他主张的生利主义职业教育,并未像儒家两千年来深怀忌讳地掉进自私自利陷阱,而是声明职业教育非为生计,而为利群。生计需求的满足是个人的权利,社会需要保障每个人的这一基本权利,但职业教育需要有更高的目标追求。陶行知所说的“生利”,不是指获得个人利益,而是特指“发舒内力以应群需”,即“利群之精神”。以“利群”作为“生利”的价值追求和评判圭臬,“生利之人”非为自私自利去谋求个人温饱生存或奢靡物欲,而是通过为自己生利,而实现为社会和国分享,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建设者。

劳动教育重在培养劳动的身手

劳动教育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自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后,各地在开展劳动教育的同时,依然存有一些困惑,有人认为劳动教育就是培养人的劳动素养,何为劳动素养?如何评价不同个体特征差异的劳动素养?

陶行知曾经提出培养“劳动的身手”的观点,比较通俗,也好判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尊重、热爱劳动的价值观念、勤劳的习惯和劳动技能。陶行知在办晓庄学校时,就要求即将到农村做教师的学生必须学会种菜和做饭,并写诗嘲笑“书呆子烧饭,一锅烧四样:生、焦、硬、烂”的现象,他要求每个学生与学校周边的一户农户结对交朋友,以养成他们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感情,实现培养“劳动的身手”的目标。

他认为,劳动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健康发展,它需要同时发挥培养人的健康体魄、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将劳动教育作为整体教育的一部分,才能培养孩子自己动手,发现劳动机会,学会看事做事,养成自主劳动的品质和能力。

在生活教育的观念里,生活与教育范畴相等,劳动为生活的一种表征。劳动是在生活之中的,不是生活之外的。生活中的需要就是劳动的动因与课程内容:生活需要卫生,保持与打扫卫生就是劳动教育的内容,习惯了在整洁环境里生活的人看到不整洁就会产生动手打扫的动机,并通过动手打扫而过上整洁的生活;生活需要饮食,烧饭做菜就是生活的需要,也是劳动教育的过程,品味自己做的食物就是对自己劳动成效的评价;生活需要待人接物,参与待人接物就是劳动的锻炼,还会养成热情好客的阳光个性。推而广之,生活需要科技,发明创造技术也就是一种劳动;生活需要探明真理,探索真理也是劳动。

陶行知曾给人写了副对联:“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这样的劳动不只是体力劳动,而是以心制力,具有“行动、思想、新价值产生”的创造性特征。由此延伸开去,在当今的信息化社会,劳动又具有信息化、乐趣化、多样化、选择性等特征,复合型劳动已成为当今最主要的劳动形态,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对一些青少年热衷于虚拟生活,现实感弱、不会表达感情也读不懂他人的情感,社交交往能力下降的现象,既要扩大包容度,又要积极引导。

陶行知教育思想是世界现代教育思潮与在中国的教育实践结合的产物,生活教育理论遇到实践问题展现出了一片新的视野,与此同时,陶行知教育思想本身也需要在解决教育突出问题中丰富、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参与生活教育,进一步利用陶行知教育思想资源积极实践探索,把我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和教育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晏阳初(1890年—1990年),别名晏遇春,四川巴中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聘顾问,中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先驱,与陶行知并称为中国平民教育的“南陶北晏”,与梁漱溟、卢作孚三人并称为“民国三大建设家”,与爱因斯坦一起被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20世纪50年代后,晏阳初担任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将他在中国定县探索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经验推向世界。他的足迹遍布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以自己的理念与思想改变了上亿贫苦民众的命运,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著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告人民语》(与赛珍珠合著)等作品。

晏阳初毕生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事业,形成了简单实用、便于推广的教育方法,创造了向实践要真知、在实干中造福的乡村改造道路,提出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学习观。这种学习观及其实现途径,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开智济世 强民救国

晏阳初一生尊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思想。他结合儒家的民本思想、基督的普世思想,同时受到了乡村苦力们的深刻影响,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新思想、“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人民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他认为只有民强才能国强,强民才能救国。他一生都矢志以平民教育启迪民智,以自己的言行唤醒民众,以“不流血”的方式达成强民救国的伟大目标。他为此秉心直行,终生无悔。

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的出身与成长经历有关。晏阳初出生于四川巴中的书香世家,自幼跟随身为塾师的父亲熟读孔孟。14岁又入阆中天道学堂接受西学,17岁到成都华美学堂进行系统的西学训练。蜀道自古难行,多有凶禽猛兽,在动辄数月跋涉山水的求学路上,他常与那些苦难的“背二哥”(挑夫)为伍,所以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深入中国的苦力世界,深感苦力之劳苦。在阆中天道学堂求学时,受到以“谋勇俱绝”著称的满清第一名将杨遇春影响,自行改名“晏遇春”,要救万民于水火。1913年,他考入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又进入美国耶鲁大学读书。在行万里路中,他见了万里风物,同时也有万民之困苦,同时深感祖国积弱积贫,在耶鲁主修政治经济学,立志改变祖国面貌。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在耶鲁大学毕业后第二天,他就以教育秘书的身份,奔赴法国战场,为华工当翻译、写书信,教那些目不识丁的华工识字读报,并编写出版《华工周报》。某一天,他收到一位华工来信:“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晏阳初读信后深受感动,并由此发现了“苦力”的“力”,让他久埋心中的济世理想找到了突破口,立志一生不当官、不发财,献身于开发民智,以达成小立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救世目标。开智济世,强民救国,这就是晏阳初学习观的主要内容,也是他人生观中的重要思想。

简单实用 自成体系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语)。晏阳初从小就崇尚惟实惟用,一切言行都特别贴近生活。他说:“我所学所做都是围绕着更好地让广大平民开启民智、造就新民而展开。”他从日常生活以及报刊中,挑选出最为常见的汉字,编成《平民千字课》,作为平民教育的教材。从不识字的人只要每日学习两小时,连续学习四个月,就可以达到读书写信看报的水平。

你是人 我是人 不贫与富 不分尊与卑 同是中国人 人人该平等 人不该平等 中国该平等

这就是他所编教材中的内容,简明易懂,琅琅上口。孔子认为天下所有的人,不分地域、贫富、老少、贤愚,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正是所谓“有教无类”。晏阳初把这种教育思想提升到涉及所有平民的革命性高度,以普遍性的方式开启了中国当时的民智运动。他将所有未受过教育的底层平民作为对象,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贩夫、走卒,不分男女老幼和年龄大小,只要他们愿意学习,都可以随时随地参加免费的学习。

晏阳初特别注重一个人当有系统学习的观念,只要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就可以收到实效。他从回到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就立志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打造成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一大发现”——脑矿,“两大发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三大方式”——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卫生、公民,“五个结合”——与实际生活、理论与实践、科学与农村实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个人与集体的结合,“六大建设”——政



1948年在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会上,晏阳初(右一)与爱因斯坦等人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他在深入调研、统计分析认为“贫”“愚”“弱”“私”是民众主要毛病,所以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让普通民众识字,再系统地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通过实施“四大教育”,从而开启民智,造就新民。在河北定县试验时,他专门创办了适宜农民阅读的《农民周报》,打造了流动图书馆,搭建了农民剧团,开办了最早的农村广播电台,这些在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一种学习思想与教育思想不是可行,特别是自成体系的思想是不是具有可操作性,成了是否可以取得成效的关键。晏阳初的教育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同时又是简明易懂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所以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可以推广,并取得了特别明显的效果。

言传身教 以人化人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语)。晏阳初特别重视向实践学习、向民众学习,他说:“要想‘化农民’,就必须‘农民化’。”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什么是教育》)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晏阳初当年携着眼金发的妻子许雅丽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毅然离开北京,带领一大批有志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来到定县进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实验。他们住农民房、穿农民衣、吃农民饭,与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地向农民学习,甘当小学生。为拉近情感,从不抽烟的他,拿起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并说“味道不错”。在这十多年里,他以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创办了一个“人类社会实验室”,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化农民”就须“农民化”的重要理念。

“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晏阳初始终以“人”为航标,相信人的尊严和价值及其重要意义。他在定县农村改良动植物品种,由平教会亲自引种试种,让农民自行择优选择优良品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举办了多个试验农场,改良当地的猪种和鸡种;他还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互助社、合作社,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等经济活动,进行多种多样的“生计训练”。同时,他会慢慢让农民自己进行组织——不是被教,而是自救;不是被救,而是自救;不是带给农民知识,而是让农民慢慢地有所认知。晏阳初说:“我们下去不是救农民,一方面我们要向农民学习,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另一方面,也是让农民自己去救自己,使自己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完善的人。”言传身教,以人化人,以具有境界的自我为标志,同时也让他们自身成长和发展,既具有外在的压力,也有内在的动力,在他们身上实现强大的造血功能,所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兼收并蓄 去旧创新

晏阳初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同时接受了西学的熏陶。他称自己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物”。

晏阳初崇尚创造,学习西学,却并不迷信西学。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中,他认为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际的、彻底的研究不可”。他并不反对外国优秀的东西,但主张对本国历史文化环境务必彻底研究,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对于外国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

“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与事业。”他说。美国曾经系统地引进“定县经验”,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等多方面思想汹涌而来,中国成了一个接受者,是西方“小学生”。晏阳初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实践,则揭开了中国经验反向传播的序幕。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和思想传统的问题上,兼收并蓄,去旧创新,成为晏阳初的重要思想主张。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并且一直做得相当的出色。一百多年以来,有的人主张全盘西化,有的人主张自我封闭,而晏阳初中西兼容的主张,不仅是相当实用的,同时也是特别科学的。

晏阳初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救世观,他一生所服务的是世界上最让人忽略的底层劳苦大众。他所主张的学在于用,以用提升学,始终将自己的所学和治学,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高度统一起来。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和学习观念,已经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跨越了种族和阶层的界限,达到了一个人类和世界的高度,成为20世纪早期和中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者。

从脚下的泥土中寻求真知

——晏阳初的学习观管窥

□ 苗勇